

穿越兩岸歷史現場的文化認同

台灣著名作家 陳若曦



台灣的傳奇女性本來已足夠多，但如果你知道陳若曦的故事，會感嘆這又是一則令人敬服的傳奇。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，陳若曦曾親歷台灣「二二八事件」與內地文化大革命兩場浩劫，她也曾為了台灣的「美麗島事件」的被告，從海外回來當面向蔣經國求情。本來無心參與政治的她，對中國的民族與情感認同，卻在歲月中被淬煉得格外堅定。她相信文化勝於一切，也不斷強調，自己是台灣人，也是中國人。文化的血脈，牽引着她從美國到內地、再回歸台灣。而她的著作《尹縣長》，也成為對中國文革時期的一份真實人性寫照。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黃偉邦

文=香港文匯報 陳=陳若曦

文：您個人在青春歲月中曾同時經歷過兩岸的兩場重大動盪，有過這樣的經歷，對定位自己的家國情感有怎樣的改變？

陳：我覺得一切人和事都在改變，總的來說就是往好改變，現在的中國政府做法就跟我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很不一樣，所以我是蠻樂觀的。

文：您在文化認同上認為自己是台灣人，也是中國人，但目前的兩岸現實語境中又有很多無法達至互相理解的地方，您怎樣看待？

陳：台灣很多人現在越來越說他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，我覺得這個是自欺欺人的，你怎麼樣你都是中國人，你到一個陌生地方，外國人他搞不明白你是哪國人，過去會問Are you Japanese? 現在是問Are you Chinese? 人家不會問「你是台灣人嗎？」人家不搞這一套的，所以你自以為我是台灣人，其實是一種自己情緒的反應。你就是中國人，你長的樣子，你的文化、背景，都是中國人。

文：這種對中國的情感認同，與自己年輕時在內地的生活經歷有關嗎？

陳：我覺得我很小的時候，我們家情感這方面就蠻強的。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嘛，可是台灣剛剛光復日本人走了的時候，有天晚上我爸爸就出去了，第二天清早回來很累的樣子，他說：「昨天我們把警狗打了一頓！」那種情緒你就可以理解。

後來電台開始教國語，我爸爸就趕快去換了一個破的收音機，自己把它弄一弄，要我們學「中國話」。所以我們很早就學國語。我覺得我們家也不是特別的，其實整個台灣的人是這樣，後來出現「台獨」論調是各種情勢發展或者受到煽動產生的改變。

其實台灣人很多像我爸媽那樣，就覺得自己是中國人，你日本再管我五十年，我依然是中國人。

文：香港近年本土意識演進激烈，你怎麼看待港台兩地與中國在一些政治意識上的衝突？

陳：我想香港的「港獨」、台灣的「台獨」有個共同特點，就是受過幾十年殖民教育或影響，所以常常下意識覺得自己比一般中國人高一等。像我們台灣動不動就說「大陸人好叻呀」，前不久有一個新聞，大陸遊客來台灣，因為大陸人只有一個小孩很寶貝嘛，小孩尿急，來不及就在餐桌上給他小便，這在台灣變成好大的新聞。

但我相信這個都會過去。因為1980年代台灣人剛剛開始可以回中國旅行時，我記得在一個餐廳裡面，我坐在角落，一個台灣旅行團過來，也是大聲嚷嚷，因為他們覺得當時台灣經濟蠻有錢的，跑到中國去底氣就很足，聲音很吵，我當時在角落裡，唯恐人家認出我也是台灣來的。

但現在台灣旅行團絕對不會，我有信心會改變的，慢慢地，社會、文化背景、教育進步都會影響你，我對內地人有信心。

「回台灣最短的路是通過北京。」

文：可以談一談1966年時怎麼會選擇去中國內地生活嗎？

陳：我本來住在美國，不知道有「文革」發生，當時正準備要回到台灣，我在美國念美國文學，本來想去台大開美國文學課，結果碰到我先生，他家裡是福建軍人，他小時候在福州看到國民政府抓兵，對國民政府很反感。那我們台灣人經歷過「二二八事件」，對蔣介石專制我們也很反感，他說要去大陸，我就覺得真的可以考慮——畢竟共產黨把國民黨趕到台灣，那共產黨一定比較高明，我就說好好好那我們一起去。

我們都是要報效中國的人，我那時候說「回台灣最短的路是通過北京。」還自以為很豪邁。一開始回到內地是呆在上海，之後住在北京，住了兩年多旅館，在那裡懷孕生孩子。

文：那幾年的生活艱難嗎？

陳：生活不艱難。本來國家給我們甲等飯票，我趕快去問那個飯店最低等的飯票是什麼？原來是丙等，我們馬上就換丙等。後來住下來只有我們家吃丙等——不過其實也沒差多少。別的海外歸來的家庭就是每頓有肉菜，我們是肉菜少一些。

文：您去中國內地之前對中國的印象和去之後的印象差別很大嗎？

陳：當然，過去我們很天真，在美國念書的時候，已經看了一些雜誌，發現內地跟台灣長年所宣傳的「大陸人民很可憐」並不一樣，內地並沒吃草根樹皮。等到真的去了，正好是「文革」，所以也不能用那個作為標

準。但確實能看出「文革」是極端突出政治。

所以現在我覺得大陸變得好多了。不要說現在，若干年前，我去雲南旅遊，導遊和我混熟了覺得陳老師很好講話，就開始跟我數落政府官員的不是，以前哪裡敢啊？導遊甚至還批評毛澤東，不可思議對我來說，跟「文革」那時完全不一樣的氛圍。

文：您的小說《尹縣長》名滿天下，而您當時身在海外寫中國，文化上的認同感是怎樣的？

陳：文化的認同就是一個人對自己民族、對中華文化的認同，沒有什麼特別。在海外多年，我從來都是一個中國人，我不會想要往美國，我為了回台灣住，跟我先生友好離婚，三棟房子都給他，現在我自己租房子住，你就知道我這個人的決心。

寫「文革」鬥爭其實我也不是很深入，我只是當了七年的觀察者。

文：你現在看到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，有意願再寫一寫當下中國嗎？

陳：沒有，因為我不住在那裡，我都是寫我住過的地方，我比較熟悉的地方的，所以我很早就回台灣，想寫台灣。

台灣有兩個部分讓我印象很深，一個是經濟很好，一個是宗教很發達，我就決定寫宗教，所以寫了以佛教為主的小說。我只能寫我熟悉的認識的事，所以我現在絕對不敢去寫中國。

既是時代所趨 也是個人選擇

編按：當年，陳若曦為「美麗島事件」去見蔣經國，相當有趣。蔣經國正襟危坐，雖然客客氣氣，但是每半個小時必有人進來通報事情，蔣經國每次的回答都是「給陳女士倒茶」。來回一兩次之後，她當然明白那其實是讓「總統」下逐客令的機會，恰好蔣經國願意跟她這個在海外呆了許多年、看法獨到的人聊天，所以逐客令半個小時又半個小時，依然沒捨得下。

文：您本身並不是一開始就對政治有興趣的人，但是因緣巧合被拖進這麼多政治事件中，您怎麼看待個人選擇跟時代之間的關係？

陳：被拖進去大概是因為我的性格，我說話坦率，我關心社會，所以人家發生什麼事常會想到你。民主運動本來和我毫無關係，我離開台灣十七八年了，結果聶華苓

打電話來，說我很有機會見到蔣經國，請我去幫忙求情。我當時說「跟那個特務求情？no way no way」。聶華苓說《自由中國》社長被殺的時候，我們也希望海外的胡適能回來為他求情，但胡適沒有，我們到今天都不原諒他。我一聽嚇死了。我是胡適的粉絲，胡適他們都不原諒，那我一定要被吐沫淹死。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都要試一下。

文：所以這是個人的選擇？但也是被時代推到那裡？

陳：被時代推到那裡，自己也要願意做。

文：這些年您開始寫與佛教和女性主義相關的小說，為何會有這種轉變？

陳：我從年輕開始就支持婦女運動，然後發現台灣宗教發達，特別跟女性有關係。台大有個教授是比丘尼，你能想像嗎？在五十年前四十年前？

從前我們知道出家像我媽媽那個年代叫遁入空門，可憐得很，是沒地方可去了，現在不一樣啊，現在是譬如大學二年級三年級我如果決定要出家，那不是無處可走，而是覺得不結婚可以專心做一些事情，是一種生命意義的追求，這是很大很大的台灣佛教的進步。

在1930年代，星雲和尚說不要寄託來生，要人生佛教，台灣把它昇華叫人間佛教，所以現在佛教承擔了很多救濟社會、鼓勵教育的功能，佛光山就一直支持兩岸文學論壇，我很佩服，星雲大師覺得文化很重要——而促動文化的第一步，就是正視文學。

年輕人對現實一定不滿

文：如何看待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的現實主義文學？

陳：我很粗淺，研究不多。但是1990年代台灣文壇開始可以寫性了，他們本來叫色情小說，後來龔鵬程說色情不好聽，叫情色小說。所以我們當時那種小說叫情色文學。後來我發現大陸女作家比我們大膽多了，也發現大陸的寫作內容和尺度都變得很大。當然如果你寫一個小說鼓吹要打倒政府、要獨立，那我也贊成抓起來。

文：您現在在台灣主要從事哪方面工作？

陳：我主要做老人這一塊，大概八年前我們開始成立銀髮人協會，我們就是放電影，每個禮拜放電影，禮拜四有講座。我們的目標就是老人不能夠蹲在家裡，不能自己沒有信心、也不出來運動。

我個人兩件印象深的事情，一件事是我25年前在美國，新聞上說有個女人孤獨地老死了，大家破門而入，把她廚房櫃門上面打開，全部是一包一包的藥——她整天去醫院，回來連藥包都不打開。這個我印象很深刻。

另有一次，我去榮總，看到幾個老兵，在那邊聊天，閒話家常，根本不是病了來看病。我覺得老人不能這樣子，要覺得有事做：今天看電影明天參加演講，人一定要走出來。按照西方的積極態度，一個老人從躺下來到見到上帝，應該只很短的時間才對。

文：您也曾經在香港短期生活過，怎樣看待如今的香港？

陳：香港比之前富裕和自由多了。我1973年來香港住過一年，當時是從大陸離開，到香港住。後來香港九七回歸之前，我趕緊申請了一個工作來做編輯，又住了一年，因我想看1997年怎麼過渡。現在有時開會過來，覺得香港繁榮多了，當然人也變多了，原來四百多萬人口，現在七百多萬。

文化氛圍上，看到書展去年100萬人入場我很驚訝，台灣辦書展沒有呀，二十萬不得了，儘管香港人自嘲說他們一年才出來一次買書，那不管了，一年出來這麼多人，一百萬人很不容易，所以我覺得香港文化氛圍很不錯。

至於年輕人的悲觀，台灣年輕人也悲觀，因為機器取代人工，年輕人最慘。年輕人有很多幻想，所以對現實一定不滿。年輕人就是要對現實不滿、有批評、有要求，但是不要害怕。

採訪流沙河的番外篇

因抗戰專題的原因要採訪流沙河先生，打聽到他家的聯繫方式時，聽聞身體不是很好，還怕會拒絕採訪。當我打電話給他，老先生雖然說話有些費力，但很爽快地答應接受採訪。

採訪那天成都連日的雨停了，陽光大好，連天氣都來助陣，如此熱血。流沙河先生住在鬧中取靜的老小區，放眼望去，多是老人，閒散地曬曬太陽、遛遛狗。我們到先生家門口，先生站在門口接我們，很是平易近人，抬頭望去，是個瘦弱的尋常老人形象。去之前了解到他倡導繁體字，只說方言，於是親切地用四川話跟他打招呼。

他把我們領進門，坐下後周盼遞上名片，老先生看到「盼」字就來了興致，娓娓道來：「盼，來自《詩經》，黑白分明，形容女子眼睛很好看，是個很美的名字。」然後先生又問我們採訪什麼，如何採訪，心裡了然後說道：「我眼睛不太好了，只能逆光坐着，嗓子也壞了，說話聲音小，你們錄音這些放近點。我是很願意跟你們聊聊抗戰這個事情的。」說着就把小桌子拖過去，離他近點，我心裡覺得這個舉動，老先生很是可愛。打量家中陳設，沒有想像中的十分古香古色，只是簡單樸素清雅的文人感覺。比較顯眼的是客廳角落的呼吸機，可以想見老先生身體的確不濟，對他接受我們

採訪又增了一分感激之情。

老先生用平緩的語調講訴他曾經歷的戰爭，外面小區在修建，車流聲和機械聲時時傳來，但我已然是帶進了幾十年前的那段歷史。他說自己出生時正逢「九一八事變」，自小命裡與抗日戰爭掛鉤。然後詳盡地講訴了成都大轟炸時，他親眼看見成都的天都被燒紅了，倒映在冬水田裡，很是慘烈，夜晚在竹林裡也沒睡着，小娃娃心裡都很清楚這是「國難當頭」，國家有了災難，災難就在你的頭上。看見中國的飛機飛走，當時不懂事還覺得很恥辱，為什麼不在空中打擊日本？聽到一段歷史，我很沉默，幾度想哭，認真地望着先生，被歲月侵蝕的臉上也有一絲悲憤的神情。老先生講得十分形象生動，轟轟轟的炸彈聲，嗡嗡嗡嗡的尖銳警報聲，小孩屏住呼吸不敢說話空襲的那種害怕，甚至因為捐8個銅板被老師讚揚那樣羞紅的臉，都在他的敘述中一一展現在我的眼前。

老先生條理邏輯清晰，連水都未喝，沒有停歇，就給我們講自己修建廣漢重轟炸機機場的事情。那樣小的年紀，吃的是最差的米，蘿蔔絲加鹽就是菜，睡在地上，每日工作從早到晚不曾休息。手破了皮，流了血，也沒有任何人偷懶，都知道這是神聖的事情。那一刻真的是很佩服，全憑意志信念修建機場的人們，而現在已



流沙河先生（劉亮荀攝）

經沒有多少人在意這些了，如果再不記錄，很快這段歷史也會隨着時間掩埋。

先生也不忘說些趣事給我們聽，還講美軍周末開着吉普車來縣城，拍照紀念。沒有發生過一次和美軍的衝突，他們人都非常好，老百姓對美軍也很好，知道國家快亡了，他們來幫助我們。最有趣的就是機場不設防，小孩子可以隨便進去玩，有個美軍休假，帶上一個小孩去澳洲休一個月。這邊還以為小孩被拐走了，結果穿了新衣服，口袋裡塞滿美鈔，安全地送回家來。還說當時物資緊缺，周圍的百姓去偷美軍的軍大衣、肉罐頭、甚至槍支，但他們從未追究，有時早上醒來發現軍靴被偷了，自己雙雙新的便是。說到這些，先生也笑起來，帶着點頑皮。看以前的採訪，別人總是說先生睿智，但給我印象更多的是天真謙和。

後來他領我們去看他寫的書，先生晚年，考據漢字，倡導正體字，一筆一劃地寫出來分析，讓我又多了幾分崇敬之情。我問他：「還寫詩嗎？」他說：「寫呀，我還在寫小說呢。」又請教他我的名字，他把「寧」的篆體字寫在紙上，說：「房子裡面，上面是心，中間是飯碗，下面人就安心了，這就是『寧』。這樣的名字寄寓了多美好意義呀，我偏向繁體字，原因也在於，簡體字無法表達文字豐富的內蘊。」

臨走時，先生說送我們下樓，我們連忙推辭，他又仔細地詢問了我們三人的名字，然後笑着說再見，還謝謝我們。我很感動，從中領略到舊時文人的儒雅之風。

就用老先生的話結束吧：「這些事情幾十年過去了，畢竟戰爭也過了幾十年了，今天的日本也不是從前的日本，今天的中國也不是從前的中國，這些歷史終歸要沉澱。我人老了，沒有那些豪情壯志，也說不來空言豪語，覺得和平最為珍貴，應該向前看。我雖然80幾歲，還在寫書，還在做事，很珍惜這個歲月。」 文：宗露寧